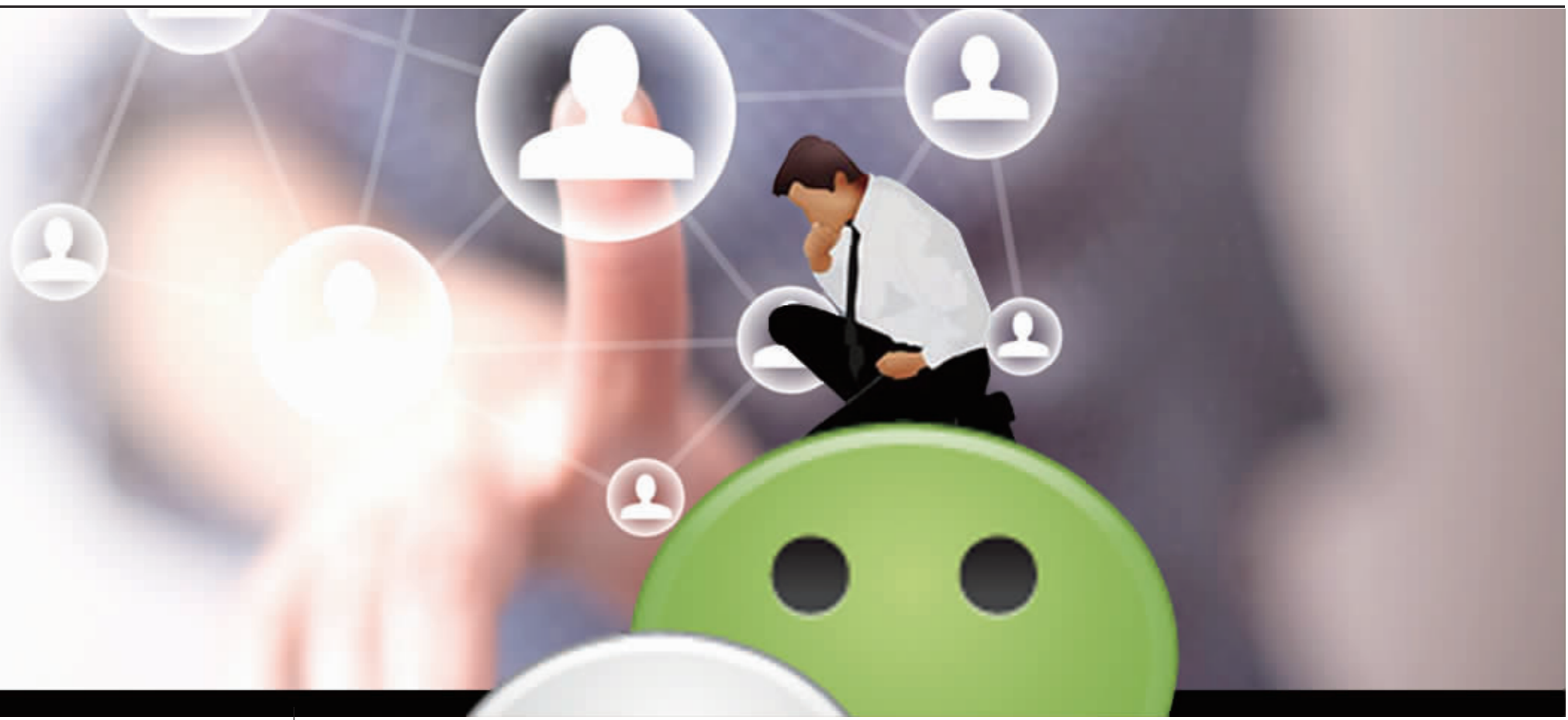


现实中,很多人不再愿意与人面对面交流,却愿意把照片和体会发在微信朋友圈里;很多人不再深入阅读,却在朋友圈里的心灵鸡汤深信不疑;很多人在现实生活中标榜特立独行,但在没收到朋友圈推送的宝马广告时,在朋友圈里自嘲为生活的失败者。朋友圈就像是一面镜子,镜子里的我是另一个我。镜子里,每个人的身份都可能跟现实中不同,有人更诚实,有人更虚伪。一个“更”字把一个人变成了两个人,或者说同一个人因为朋友圈的存在实现了一次或成功或失败的“人格分裂”。

而这种分裂背后,则是一种新型的“社交综合征”。

现代快报记者 贾磊

对成功的渴望 正在微信朋友圈催生一次次“人格分裂” 一辆宝马引出 身份的焦虑



制图 沈明

品红酒,听歌剧 让她看上去更精致

“今天去了一处酒庄,酒庄老板热情接待了我们。午饭时,他拿出一瓶1978年的‘武当老柴’。”



“像我这样的屌丝,居然能收到宝马广告。”刘杉在朋友圈发了一段“自嘲”的文字。不过,她的脸上可没有多少自嘲的表情,而是一派沾沾自喜的样子。这引来了她老公的嘲笑,“一个宝马广告而已,又不是送你一辆宝马。”

“你懂什么,这说明微信认为我是宝马的潜在客户,这叫大数据。”

1月25日,微信在朋友圈推送广告,有人收到了宝马的广告,有人收到了VI-VO智能手机的广告,有人收到的,却是可口可乐的广告。这让朋友圈里炸了锅,四处都是酸溜溜的醋味。

收到宝马广告的人最为得意,俨然一翻手机,便拿到了一辆宝马。

不过,如果从头到尾翻看刘杉朋友圈的话,你一定会为“大数据”赞叹——这样一个生活精致的女人不买宝马,谁会买?

“今天去了江宁的一处酒庄,酒庄老板热情接待了我们。中午饭时,他拿出一瓶私藏的葡萄酒,1978年的‘武当老柴’,仔细品了下,烤木香、果香、肉桂的香味,很有层次感地缓缓透出,丰富的内涵让人回味无穷。”

“今天收拾房间,发现了一幅画了一半的画,要不要画完呢?”

“今晚去听歌剧,7:30到9:30不要给我打电话。”

当刘杉发出类似的感慨时,她确实正妆容精致地出门。不过,她的生活远远不像朋友圈暗示的那样光鲜。

刘杉今年26岁,在一所小学教语文,平时工作勤恳,却总觉得生活不够精致。朋友圈成了一个最好的展示平台。

“又不是我一个人这么做,我所有的朋友都喜欢这样的生活,这没什么不好吧。”刘杉说。

共同的价值观,让刘杉的朋友圈更加纯粹——喜欢精致生活的人们在上面讨论咖啡、美酒、蛋糕和宝马,愤青、段子手和心灵鸡汤被屏蔽了。代购倒是留着——这便于让刘杉和朋友们用更低廉的价格享受到更精致的生活。

“发了年终奖,我要去趟尼泊尔,多拍些照片。”刘杉说。



“愤怒的评论员” 增强了他的存在感

“我不想交到更多朋友,只是想让目前的朋友更关注我。特立独行的观点能够吸引别人的注意哦。”

“刚刚看到新闻说,储户存款消失,从几百万到几个亿不等,储户索赔无望,对此我深感恐惧,赶紧骑车到银行查看,卡里的50块还在。以后再也不看新闻了,心好累。走出银行,一看自行车没用了!”2月4日晚上,胡宁(化名)在朋友圈里写下这样一个段子。

这样的文字让胡宁的朋友们既诧异,又熟悉。

诧异的是,这充满了调侃的段子不像是胡宁平时的作风——这个29岁的 New Public Servant 在现实世界里可不是一个愤青,他腼腆、木讷、亲和,与愤怒一点不沾边。

不过,看看这位年轻人的朋友圈也就明白了——他的每一条信息都像出自一个称职的新闻评论员之口,有的辛辣,有的调侃。

三三两两的评论跟在这些信手拈来的信息后头,让胡宁像“喝了烈酒一样痛快”。

“我不用担心被领导看到,或者被‘查水表’。”胡宁说了一个同样用以调侃的网络热词,“朋友圈是我私人的圈子,里面既没有领导,当然也不会有告密者。”

胡宁是淮安人,2005年考进南京一所大学,从小到大,他都是一个听话的学生,相信努力读书会改变命运,相信理想可以改变现实。不过,理想很快被现实动摇了。

“毕业时,我先进了一家保险公司做业务员,这工作跟我的专业毫无关系。但我必须去。”胡宁说,他没有能力选择工作,因为刚毕业的大学生多如过江之鲫,“招聘会上,我挤开了好几个人才去了简历,这却成了公司HR最赏识我的一点。”

这份工作的报酬是1000元加提成,在南京没有人脉的胡宁每个月到手只有不到2000块钱,扣完房租、吃饭和网费,已剩不下什么。

更重要的是,这份工作极不稳定。“每个月都有人走,有新人进来,压力特别大。睡觉时会梦到上班的情况,

醒来一身冷汗。”胡宁说。微薄的收入和卑微的地位,让他有种不安全感,也让他觉得没有存在感。

现实过于普通,他不得不求助于网络。还好他赶上了好时候,智能手机颠覆了过去的很多东西。

“我不想交到更多朋友,只是想让目前的朋友更关注我。所以,我在朋友圈里玩游戏,在朋友圈里当愤青。”胡宁本不是一个喜欢电子游戏的人,大学时代,全宿舍的人都疯狂地玩起了《魔兽世界》,他却嗤之以鼻。

但在毕业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强迫自己用手机玩一款名叫“天天酷跑”的游戏,为此,他甚至充了好几百块钱。

“我在上面是第一名,打败了我所有的朋友。”胡宁有些小得意,但很快又失落了,“大家羡慕我、嫉妒我,但没人会在上面跟我交流。”

为此,胡宁不得不把自己伪装成一个愤青,他的理由是“特立独行的观点能够吸引别人的注意”。这种特立独行或者偏激的观点,让胡宁获得了一些从未有过的存在感,尽管有些观点是他借鉴来的。

很快,在现实中卑微的胡宁和朋友圈里挥斥方遒的胡宁都发现,这样的做法毫无用处。终于有一天,他明白了自己的处境,开始为自己选择另一个人。

“当你周围都是米的时候,你很安逸;当有一天米缸见底,才发现想跳出去已无能为力。有一种陷阱,名叫安逸!别在最能吃苦的年纪选择安逸!没有危机,是最大的危机!自己不上进,危机无处不在吞噬你的理想和灵魂,混下去很容易,混上去太难了。”在接受采访时,已经考上公务员的胡宁依然把玩着自己的智能手机,嘟囔着哲学家一样的观点和鸡汤。

“我还会继续在网上表达自己的观点,还会像现在这样。这样也没什么不好。”说这话的时候,胡宁一点儿都不像一位新晋公务员。



深夜发诗 让他回归“文艺生活”

“这个圈子特别适合写诗,圈子里都是朋友,朋友可以评论,可以互动,不想看的也可以无视。”

“十五分钟前/月亮悬在华侨路/离一幢楼顶不超过一米/十五分钟后/月亮悬在北京西路旁/南大校园的上空/再过几分钟/等我回到家/它就会悬在我的头顶/如果我的头顶没有天花板/没有钢筋和水泥/没有鼾声和梦境/我就会清楚地看见它/这个月亮一定是悬在了/我仰望的那个地方”

2月1日凌晨3点,周闲(化名)在出租车上,用手机写下这样的文字,然后发在了朋友圈里。

看着他嘴里念念有词,出租车司机很好奇。周闲的装扮不起眼,不像是这个点最多的那种乘客——那些刚从夜店里出来,要回家睡觉的客人。他穿着普通,戴着不怪异的眼镜,半长的头发有些油,被冬天夜里的雾气打湿后,一绺绺地贴在头皮上。重要的是,那些夜店客通常满身烟酒气,眼神充满了病态的兴奋,嘴里的话语满是卖弄和玩世不恭,这位客人却没有。

实际上,周闲累坏了,漫长的加班和纷杂的代码让他的脑子乱哄哄的,戒烟之后,唯有写诗,才能让他稍稍平静一些。

这是一个样本一样的“文艺中年”,上个世纪80年代,在大学读中文,参加文学社,在杂志上发表小说,以小说和诗歌交朋友,弹吉他,喝廉价啤酒,羞于讨论金钱。上世纪90年代初,为朋友的乐队写歌词,一天抽一包烟,讨论存在主义、波普艺术、博尔赫斯,这时,大段的时间没有了,小说不能写了,诗歌却没落下。周闲曾经想过戒烟和“戒诗”,却一样都没成功。

90年代末,这种生长轨迹被打断了。周闲找了一份正经的工作,也结了婚。“其实那个时候还是没放弃写诗,但已经不可能像以前那样了,那个时候,谁都不会再理解一个诗人了,钱,money,才是最重要的。”周闲捻了捻右手的拇指和食指。

毕业后周闲在一家出版社工作,工作多少能跟兴趣爱好挂上钩,身边的同事也还算有共同语言,周闲偶尔的小诗也

能引来“当浮一大白”之类的赞叹。但听众终究不是大学时那班无话不谈的兄弟了,渐渐地,周闲只把诗写下来,却少给人看了。不过,烟却越抽越多。

后来,周闲的儿子出生,自己也换了工作,当时IT业如同初升的朝阳一样蓬勃,可他的生活更加没有味道了,人近中年的周闲也成了别人眼中最常见的那个周闲。

早上9点多起床,简单洗漱后,出门去公司,偶尔开会,大部分时间都是忙于机械且重复的工作,午餐,与同事吹牛,继续工作,夜里加班时,更是没时间写诗了,满脑子都是数据,半夜3点左右回家,轻手轻脚地吃一点老婆留给自己的夜宵,去儿子房间门外看一眼儿子,再就着客厅的灯,检查一下儿子写好的摊在桌上的作业。

这样的生活让周闲厌恶,却无从改变。2003年时,他曾经在天涯开了一个博客,专门写诗,后来,天涯没落了,这个博客也渐渐少有读者。

直到微信朋友圈出现。“2011年吧,反正是最早的一批微信用户,好多朋友都在用这个,我也试着玩了下,当时太无聊,主要是我把烟给戒了,没闲说,戒了烟,他又开始写诗了,而且会把这些有关生活感悟的小文字发在微信朋友圈里。”

“其实这个圈子特别适合写诗,一来,圈子里都是朋友,二来,朋友可以点赞,可以评论,可以互动,不想看的也可以无视,我都是在半夜发,不会打扰任何人休息。”周闲说,他每天都会写上几首短诗,第二天起来,收获一堆评论。

这让周闲觉得好受多了。如今的他觉得,那个行尸走肉般的周闲是梦里的周闲,那个每天写诗的文艺大叔才是他自己。

■分析 我们身边的“社交综合征”

在他人眼里,我是怎样一个人?我是个成功者还是失败者?每个人的内心,潜藏着对自身身份的一种难言的“焦虑”。可有谁曾真正审视过这种身份的焦虑呢?睿智的德波顿做到了,他首次引领我们直面这一人心深处的焦虑“情结”。

住在伦敦的英国作家阿兰·德波顿,生于1969年,毕业于剑桥大学。在其新作《身份的焦虑》中,他认为,每个人都有不止一个身份,人们往往不满足于某个身份,心生焦虑,然后再从其他的方面,或者干脆再造一个身份予以补偿。

多重的身份在网络时代变得更为直观——网络聊天中,一个抠脚大汉可以伪装成玻璃心少女,游戏中,一个现实世界的失败者可以变身拯救世界的侠客,而在朋友圈中,我们几乎每个人都想在其中展现出另一个我——一个更真实或者更虚假的自己。

“信息时代,不会有人在意真正的你是什么样的,他们相信自己的眼睛看到的。”有专家说,这恰恰是朋友圈这样的虚拟社区流行的根本原因,“你终究能从中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或者伪装成志同道合的朋友。”

而在刨去了代购、心灵鸡汤、虚情假意之后,朋友圈里一种典型的身身份焦虑引来专家关注。

不少媒体都意识到,朋友圈带来一种叫做“中产阶级癌”的病症——人们在朋友圈的掩护下,“每一个未曾抵达中产阶层的人都在伪装中产阶层”。而从全球范围来看,中产阶级是一个令大多数普通人羡慕的人群,他们生活精致,工作体面,度假舒适。

《哈佛商业评论》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为什么客户的社会身份那么重要》,在他们的案例研究中,从

北欧的瑞典到南亚的印度,这种身份焦虑无处不在,以及如何抓住这个弱点来达成自己的销售目的。

作者举了一个太阳能的例子,光伏企业把太阳能架在了越来越多的房顶上,你以为这些业主主要的诉求是降低能源消耗和关注环境。事实却是,因为他的同一社区同样社会地位的邻居们都装了这样的太阳能发电机,这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购买决定——这就像他们门前一定要有修得平平整整的草地一样,这是中产阶级的标志。

还有电器生产厂商伊莱克斯的一个失败案例。他们本来打算在瑞典推出一项新服务,客户可以免费得到搭载了新技术的洗衣机,不过,他们需要在每次洗衣服时投币付费,这台新洗衣机看起来卖点多多,能耗更少,自动升级。

销售人员信心满满,活动却失败了,原因是瑞典的中产阶级并不买账——那么富裕的国家的中产阶级,谁家没有洗衣机呢?而且,投币洗衣的行为让人们联想到蓝领阶层,消费者自然不想让别人从这些细节之处质疑自己的社会层级。

但朋友圈之类的虚拟社区,给了人们一个隐藏的机会,而且不需要付出多大的成本。

不过,也有专家担心,这种“虚荣”和焦虑,会过多地投射在物质上,“用消费来肯定自己的社会地位,来发现自己的生存价值,从而消除对身份的焦虑。有位专家说起她在国内的那些同学,吃穿住行和伦敦的中产阶级比肩,而且他们在评价一件商品或作品是否值得拥有时,会更加重视那些代表某些特质的元素:它是属于什么风格什么流派的?是不是一个高级的谈资?不够纯正和正宗?真的是纯手工制作的吗?”

每个人都有不止一个身份,人们往往不满足于某个身份,心生焦虑,然后再从其他的方面,或者干脆再造一个身份予以补偿。